



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

DANG'AN YU SHEHUIJIYI YANJIU

丁华东 著



人民出版社

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

DANG'AN YU SHEHUIJIYI YANJIU

丁华东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怡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 / 丁华东 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01-015952-2

I. ①档… II. ①丁… III. ①档案工作-研究-中国 IV. ①G2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9995 号

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

DANG'AN YU SHEHUIJIYI YANJIU

丁华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7

字数: 500 千字

ISBN 978-7-01-015952-2 定价: 7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社会记忆理论与档案记忆研究的学术坐标	23
第一节 由个体记忆走向社会记忆	25
第二节 社会记忆研究的主要成果	36
第三节 多义的记忆：社会记忆内涵分析	46
第四节 在社会记忆研究中把握档案记忆研究的学术坐标	60
第二章 档案：社会记忆的形态	69
第一节 “备忘”：档案形成的原初功能	71
第二节 刻写记忆：在社会记忆形态中把握档案	81
第三节 社会失忆、档案与历史再现	89
第四节 档案记忆的结构与特点	97
第五节 档案记忆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106
第三章 档案与社会记忆传承	117
第一节 社会记忆的传承体系	120
第二节 档案记忆传承的沿革与发展	129
第三节 档案传承社会记忆的机制	136
第四节 档案馆：“记忆的殿堂”	147
第五节 我国传承下来的珍贵档案记忆	154
第四章 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	165
第一节 社会记忆建构观及其反思	168
第二节 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	175
第三节 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机制	184
第四节 档案部门建构社会记忆的能力与策略	193

第五节 档案记忆的资本化	203
第五章 档案与社会记忆控制	213
第一节 记忆的争夺：社会记忆的政治学	216
第二节 档案是社会记忆控制的“结构性媒介”	224
第三节 档案对社会记忆控制的双向模式	232
第四节 档案对社会记忆控制的工作机制	241
第五节 档案与社会“反记忆”	251
第六章 档案的记忆能量分析	261
第一节 档案记忆能量的意涵及其分析向度	263
第二节 档案资源量与记忆能量	270
第三节 主体需求与档案记忆能量	279
第四节 主体能力与档案记忆能量	286
第五节 社会权力结构与档案记忆能量	293
第六节 社会情境与档案记忆能量	300
第七章 档案记忆与现代传媒展演	309
第一节 媒体“宰制”时代与记忆的媒体研究法	312
第二节 现代媒体与社会记忆的再生产	320
第三节 现代传媒对档案记忆展演的方式	328
第四节 现代传媒对档案记忆展演的机制	335
第五节 档案记忆与现代传媒的合作共荣	344
第八章 档案工作与社会记忆构筑	355
第一节 新形象：社会转型与档案工作者的新角色	358
第二节 新资源：社会记忆构筑的新对象	367
第三节 新规则：社会记忆构筑的新要求	376
第四节 新实践：社会记忆构筑的新典范	386
第五节 新范式：档案学理论的新体系	395
结论与展望	405
附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415
主要参考文献	419
后 记	425

绪 论

档案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载体论思维定势,即每当新的观点、新的取向一经出现,我们就得出结论说“档案是……载体”,于是我们就有了“档案是信息的载体”、“档案是知识的载体”、“档案是文化的载体”等表述。我们在不停地宣称档案如何重要,但理论研究经常无法深入下去,往往只是给档案贴上一个时尚的“标签”。自档案记忆观产生以来,情形也是如此。档案学研究如何走出载体论,走向要素论、功能论、资源论,还需要我们探索一条发现之路。

一、档案学研究的实用取向与解释取向

(一) 档案学研究的实用取向

自有档案学学科性质描述以来,档案学界就将档案学视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实践性学科。新中国档案学创始人吴宝康先生在《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中,曾明确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强调指出,档案学的实践性较之其他学科来说,具有更强烈、更突出、更鲜明的特点。档案学具有实践性,主要是由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所决定的……档案学不可能是像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那样高度的理论性很强的科学,相对而言,倒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① 吴老的这一思想及其论著,特别是通过他主编的《档案学概论》而传承光大,已成为档案学界的普遍性认识和基本定论。

在强调学科实践性的思维导引下,档案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我们默认的学术取向,即实用取向,或者说学术的实用主义传统。这种取向简单地说就是以实践为目的,以解决现实管理问题为旨归。其具体表现为:①在研究目标、任务上,强调应

^① 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

用性。学者们认为档案学不是纯粹的思辨性学科,“档案学研究不仅是为了认识规律,探索事物和对象的本质,更是为了指导档案工作实践,而且后者更显重要。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档案学侧重于对一些具体的科学管理理论、原则、方法和应用技术的研究,即使是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大多是带有根本性的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①②在理论形态上,应用管理部分占据了非常突出的位置。林清澄、李生荣在《档案学的两种理论形态》一文中指出:“应用档案学是贯穿自档案学产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种理论形态。在我国目前的数十种档案学期刊中,只有极少的几种避开了这种领域的研究。在我国1993年底出版的441部中外档案学新旧著作和教材中,这种形态或以这种形态为主的,占97%还多。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撰写和出版的档案学专著,则全部为应用档案学。进入80年代以来,虽然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理论档案学研究成果颇丰,但由于关于档案管理现代化的研究,关于档案管理方法、技术、规章制度和机构体制的研究,关于档案收集、分类整理、编目、保管、鉴定、提供利用的研究等,不仅始终如一地进行,而且成果之远远胜过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档案学这一理论形态仍然牢固地占领档案学科学体系中的大块阵地”。^②③在学科发展方向上,注重经验的获取和提升。无论是老一代档案学者、现在档案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还是普通的研究人员,在谈到档案学未来发展时,都曾强调过实践经验的重要性。吴宝康曾说:“档案学终究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研究和学习档案学及其理论只有与档案工作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有坚实的基础。档案学的理论和内容,是根据不断发展着的档案工作实践所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具有实际业务指导意义的规律性的知识,它只有紧密联系实际业务,从实际业务中吸取营养,不断补充和丰富档案学的理论和内容,这样才能不断推动档案学研究的发展,取得丰硕成果”。^③

我国档案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曾有过一次关于档案学“实用经验系统”的学术争论。争论导源于王李苏、周毅在《上海档案》上发表的《回顾与展望——对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一文。文章指出:文革前17年的档案学“在理论上的最大缺陷,就是尚未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而是建立了一个实用经验系统”;“这一时期的档案学,是经验的积累,可以称之为‘经验档案学’”,甚至到80年代中后期,档案学仍然称不上科学,只有“走向未来”才能建立“科学的档案学”。^④“实用经验系统”提出后,一些文章对此质疑。一种观点认为,文革前的档案学已经有了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并初步形成了理论体系,把初步形成的档案学说成是“实用经验系统”,是对新中国档案学发展总体评价的失当,贬低了新中国档案学建设和发展的成

① 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

② 林清澄、李生荣:《档案学的两种理论形态》,《山西档案》1996年第3期。

③ 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④ 王李苏、周毅:《回顾与展望——对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上海档案》1988年第6期。

就。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实用经验系统”的提出者和批评者“都用贬义来对待‘实用经验系统’”,是不合理的。他们引用恩格斯关于经验自然科学和理论自然科学的论述,认为应当理直气壮地说:“在我国档案学发展的现实阶段上,即在现时,建立一个完善的‘实用经验系统’,或者说‘经验档案学’应该说是好得很,好得很!这是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巨大进步”。^①关于“实用经验系统”的争论,在当时的语境下是关于档案学是否形成、关于档案学学科性质与发展方向之争,但今天回顾这场争论,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实用经验系统”的提出者、反对者,还是倡导者,其学术观点和思想意识中,都在肯定或强调档案学的经验性与实用性,使潜藏的实用取向在碰撞中突显出来。

档案学研究的实用主义传统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档案学由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转向管理学之后表现愈加突出。胡鸿杰在其《中国档案学理念与模式》一书中提到,“关注管理活动实际,不仅是我国档案学者的一种价值取向,也是外国档案学者的一种价值取向”;^②“把作为部分管理活动的档案管理融入整体管理活动之中,从管理活动的基本方式出发去建构档案学,正是当代档案学人的一种共识和期盼。”^③

可以说,实用主义传统已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主导性传统,对积聚、凝练和提升档案工作经验,推动档案学和档案事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这一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辩证关系思想在我国档案学中的具体化,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弘扬。但我们也要看到实用取向所带来的诸多不足:

其一,在实用取向下,档案成了“黑箱”。实用取向强调对档案管理的实践研究,在此过程中,我们更多地注重档案信息的有序化,突出档案之间的历史联系或有机联系;更多地注重档案工作的服务性,突出提供档案信息满足社会需要;更多地注重档案的长期或永久保管,突出档案延续人类活动经验和国家利益保护的重要意义。我们虽然关注并研究了档案的性质、特点、功能,但作为管理对象的“档案”却成了“黑箱”,档案中具体包含了哪些东西,并非是我们最关心的。档案学研究中缺乏对档案内容的具体分析,我们只是在呼吁或要求档案管理人员熟悉馆藏,为国家、社会及时提供档案信息,以实现档案价值,所以档案学界难以形成与文物专家、图书馆学家或情报学家相比肩的档案(学)家。即使是在“信息资源管理”时代,我们虽也强调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但仍是“内向性管理”,强调档案的资源价值和档案信息之间的联系,注重形式而不是内容。

其二,在实用取向下,档案学研究中对策性研究过剩。档案学研究中,我们对理论的有效性、理论影响与指导实践的途径等问题未能深入思考,片面地认为理论指导

① 施宣岑:《论“实用经验系统”》,《档案学通讯》1991年第6期。

② 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理念与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③ 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理念与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实践,就是提出对策性或政策性建议,以便让实际部门有所遵循。结果如宗培岭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研究中往往不注意问题本身的研究,而多是所谓的为解决现实问题提出的对策性研究。我们的论文从结构上看许多都是必要性、现状、对策的三段论体例,许多档案学研究者成了“政策专家”,这一点在硕士研究生乃至博士研究生论文中体现尤为明显。^①近些年来,对策性研究大行其道,这与当下的学术功利化、学风浮躁有关,但我们认为也与学科的整体学术取向有着重大关联。学术研究本身是发现问题、解释问题,至于如何解决问题那是政策制定者与管理部門的事,学术研究者来提出这个对策、那个措施,结果必然是“越俎代庖”,空洞浮泛。这是学术不自觉的表现,更是对学术功能和学术责任的误解。

其三,在实用取向下,档案学研究的学理性严重不足。人们总是在不断地问:“你研究的东西有没有用?没有用,你研究它干什么?”我们的研究中理论性稍微重一点,就有人出来指责,一些学者是“坐而论道”,故弄玄虚,不切实际,是档案学发展的“祸根”。我们在强调“重心下沉”、“贴近档案实践”,但研究中学理性不足或学术性不强已是不争事实。档案学中缺乏整体性、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学派、缺乏原创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果很多,有人说是档案学的“繁荣发展时期”,但至今尚未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档案学理论,而且还在自觉不自觉地充当国外理论的“传声筒”。近年来,随着电子文件的出现及其管理的探讨,学术研究呈现出技术化、方法化趋势。我们对于档案作为社会存在物、档案工作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建制、档案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等问题,缺乏深刻的反思性分析,对社会转型期档案工作出现的深刻变化缺乏有力的解释,长期下去,我们是否真的要把档案学打造成“实用经验系统”,值得我们深思。

(二) 档案学研究需要解释取向

马克思说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本身就是认识世界的活动,更应采取解释性取向。

学术研究有诸多功能:认识功能或解释功能、预测功能、学科建构功能、知识传承功能和现实指导功能等,在这些功能之中,认识功能或解释功能无疑是基础的功能,对此,在科学哲学等学科领域都有论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著名科学哲学研究专家刘大椿教授指出:科学(理论)有两个最重要的功能——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解释功能包括因果解释、概率解释、结构解释、功能解释和起源解释;解释的过程常常是发展知识的过程,理论解释提供认识的过去和现在、揭示已知事实的本质及从理论上解释和领悟它们的可能性,科学解释标志着人类认识能力

^① 参阅宗培岭:《档案学理论与理论研究批评》,《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2期。

的大大深化。^①科学哲学专家舒炜光也指出：“科学的中心目的是探求理解，是一种意图在于不仅自然过程可预言而且可理解的探索。这就意味着去寻求我们据之可以弄懂事物变化意义的合理的联系模式”。^②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安德鲁·皮克林更是直接指出：“科学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③

说档案学是一门科学，这其中既含有对档案学“科学性”的肯定，更意指档案学是科学研究活动的一个专门领域、或一个专门的知识体系。作为一项科学研究活动，它是档案学（学术）研究主体（包括研究者个体主体和学术共同体群体主体）通过认知行动，从已知发现未知，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来探索和发现客体对象的属性、意义和规律，形成关于客体对象的观念“图式”，进而观念性地把握客体，这是一个意义发现、发掘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作为一个专门的知识体系，它是由档案学术共同体通过知识的生产、建构与积累而构成的“人造系统”，是我们通过文字、语言、图像等物化形式使形成的认识社会化和体系化，而构成的一个理论、方法、技术和观念体系，它反映了我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建构起来的观念“世界”。在此过程中，包含了如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的一种双重诠释的认知实践活动。“社会科学的观念构型体现为一种双重解释：不仅关系到参与和领会包含在普通人进行社会生活、生产过程的意义框架，而且关系到在专业性概念设计的新意义框架内对此进行的重构”。^④

在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活动与结果中，档案、档案工作乃至档案学自身，是我们认识和把握的客体对象，在认识活动中处于基础地位，而认识的主体在认知活动与建构活动中则是处于主导地位。对客体反映的程度、反映的水平，对客体的属性和运动规律的揭示，对客体意义的理解和管理行为，都有赖于主体的认知、解释和需求。正如列宁所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我们创造的档案世界因研究主体所处环境与具体对象、研究旨趣与研究方向的不同而丰富多彩。“事实表明，对于同一种客体，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条件下，而且在同一个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条件下，依主体现实的需要、目的和本质力量的性质的不同，可以引起不同的认知观念，建立不同的理论学说，形成不同的科学体系，产生不同的使用方式。”^⑤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提出档案是文件、是信息、是知识、是文化、是社会记

① 参阅刘大椿：《科学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66页。

② 舒炜光、邱仁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

③ [美]安德鲁·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译者序，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论的新规则》译者序，田佑中、刘江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⑤ 夏甄陶：《认识论引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忆等这类命题,并且以此为基础,去建构我们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可以说档案文件管理理论、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理论、档案知识管理理论等,既是我们的观念图式,也是我们建构的“对象性世界”。对于这些观念的形成及其转变,我们必须予以反思性的解释,否则不论我们如何贴近现实,深入实际,也不可能生成档案是信息、档案是知识的观念来,更不能深刻了解和把握这些观念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与推动意义。正是缺少学理性解释,我们不免感到档案学界是在不断地给档案贴上新的“标签”,以向社会宣称“档案”的重要性,而这恰恰反映出档案学的“不自信”,或如有的学者所言,档案学还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

档案学的解释取向是学术研究的本然,也是我们把档案放到社会系统之中,思考和把握档案同人、同社会、同文化的深层关系,思考和把握在社会转型环境下档案观念的形成与演变,思考和把握档案管理作为社会建制和结构性要素的运行机制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应然;更是本书研究的必然。

如果从管理的实用取向来研究档案与社会记忆(或者直接称之为“档案记忆研究”),或许我们又会陷入这样的思维定势:即档案是社会记忆的载体,是一种重要的记忆资源,我们应当加强这一重要资源的管理;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如何管理、保护它展开讨论,提出一系列对策。问题是社会记忆理论并没有提供如何管理记忆的一套知识体系或知识系统,不像信息管理那样,随着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与实践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有关信息资源管理的知识体系,可供我们参照。对于档案记忆研究,我们总不能再来个记忆的收集、保管、整序、保护、开发。我们认为在档案学研究的史料时代,我们关注的是其“整理”;在文件时代,我们关注的是其“保管”;在信息时代,我们关注的是其“管理与开发”;而在社会记忆时代,我们应关注的是其“传承、建构与控制”。这就需要将档案放到社会记忆整体中,融合更多的学术元素,形成解释性研究取向,而不再是单纯追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性研究取向。

因此,实用性取向固不可丢,解释性取向亟待增强。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曾指出,档案学研究要指向意义和价值。我们认为指向意义和价值的档案学必然是解释性的。

二、档案学:“走进记忆之门”^①

(一) 档案记忆观在学术领域与实践领域的彰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并牵头实施的“世界记忆工程”

^① “走进记忆之门”是2004年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主办的中国档案珍品展的主题。我们在此借用这一名称,一是表示档案学研究已迈入社会记忆领域的门槛,二是表示档案记忆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

项目的展开,“记忆”成为档案界伴随着“信息”与“知识”之后的又一重要概念,其影响和普及程度虽不如后者,但在国内外许多重大学术活动和档案工作实践领域已日渐彰显。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档案记忆”成为不少主、辅报告人论及的理论热点。据王德俊先生统计,在大会的20篇主、辅报告中,涉及“档案记忆”的有9篇之多。其中,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历史资源司档案整理处处长特里·库克(T.库克)在主报告中陈述了传教士利玛窦向明王朝提出的“记忆宫殿”计划,并指出现在“全世界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①2000年,在西班牙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开幕式中指出:“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各种表现形式,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②2004年,在奥地利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其主题更是直接指向记忆,大会围绕“档案、记忆与知识”这一主题,讨论了档案作为人类记忆库的重要社会功能及其相关核心问题:档案记录的是谁的记忆?从档案中找到过去的什么记忆?记忆是如何形成的?集体记忆或共同记忆的性质是什么?如何从档案中寻找记忆?当记忆不能恢复或记忆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时,档案可以帮助人们从遗忘中寻找什么?记忆与集体或个人身份的关系是什么?等等。^③

与国际档案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潮相呼应,我国档案学界在最近十多年来从社会记忆的视角看待档案与档案管理的学术事项也引人瞩目。1998年,我国档案学界首位博士毕业生冯惠玲将其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以连载的方式在《档案学通讯》上发表,对档案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2001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倡办的“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主题便是“21世纪的社会记忆”。冯惠玲指出:“本次论坛的主题‘21世纪的社会记忆’既诠释了档案事业一如既往的历史职责,更表达了档案学者对未来严肃而认真的思考。”^④此外,2007年上海大学档案学系(现为图书情报档案系)在上海“东方讲坛”举办的“档案文化与社会记忆”系列学术讲座、四川大学举办的“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学术会议、2011年南昌大学举办的“社会记忆与档案信息资源规划”学术研讨会等,都体现出从社会记忆角度对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发展的深刻思考。

在我国实践领域,“社会记忆”已成为档案部门推动事业发展、开展档案宣传以及举办档案展览的时尚名词和时代主题。2002年,以青岛市率先提出和实施“城市

① 参阅王德俊:《当前国际档案界学术新动态、新观点概述(续)》,《兰台世界》1998年第12期。

②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的致词》,载国家档案局编《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

③ 中国城建档案代表团:《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及其学术动向》,《城建档案》2004年第5期。

④ 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文集编委会编:《21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文集》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记忆工程”为标志，一场轰轰烈烈的旨在通过摄影、照相等技术手段，结合民间文献材料的收集，以全面记录和反映城市历史面貌、记载和追寻城市发展历史轨迹的档案实践项目在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展开。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沈阳、太原、长沙、福州等相继规划实施了“城市记忆工程”项目，从自发走向自觉，不断丰富和拓展“城市记忆工程”的内涵。与此同时，2004年，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举办了主题为“走进记忆之门——中国档案珍品展”，推出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二十多个国家档案馆的一百多件档案珍品，^①为群众了解档案、认识档案，领略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打开了记忆之门。^②2005年，上海音像资料馆从历经20多年精心收集的上万部馆藏资料中，精选出100段珍贵影像，集锦成《城市记忆——上海珍贵历史影像》，分“海上旧梦”、“烽火岁月”、“上海新貌”、“新世纪新上海”四大部分，全景式展现了从1898年至今的上海历史变迁，为上海人留存了一份宝贵的影像记忆。2006年，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相继举办“城市记忆系列展”，并编纂出版《城市记忆：上海历史发展档案图集》等。除此之外，档案记忆在影视传媒和互联网上也异彩纷呈，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还在有线电视中推出“记忆”、“档案”、“纪实”等专题电视栏目。这些实践活动的展开，丰富了人们对档案的想象，也体现出档案领域乃至社会领域正在以“社会记忆”新视角看待档案的时代热情和社会意识。

（二）国外档案记忆研究状况

国外较早作出档案记忆论述的，要追溯到国际档案理事会第二任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布莱邦，他认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最珍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近年来从国外透露出的学术信息（如2000年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的主题为“超越屏幕：捕捉共同的和社会的记忆”；2001年美国密歇根大学举办的“档案与社会记忆”系列研讨会等）和国外对社会记忆的研究来看，国外学者关于档案记忆的研究应该较为丰富，但限于对国外研究资料获取的局限，目前我们对国外档案学者关于档案记忆研究成果的掌握还只能说是片鳞半爪。仅就所见成果看，加拿大的T.库克、美国的弗朗西斯·布劳因、日本的大滨彻也等档案学者的成果尤为显著，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学术思想和研究视点。

^① 从唐代开元二年（714年）直到民国时期，时间跨度达1200余年，所展出的档案珍品件件堪称无价之宝。

^② 晓章：《中国档案珍品展掀起京城档案热——“走进记忆之门”档案展览社会反响热烈》，《北京档案》2004年第11期。

受后现代理论的影响,T.库克是运用社会记忆理论思考档案及其管理的积极倡导者。在1996年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中,T.库克就以记忆为导引和归结,阐述了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其目的是回顾自身发展史,考察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如何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从而在新的时期,“让我们的‘记忆宫殿’反映出适合于新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之所以以记忆为导引,或许如T.库克所言,档案人员“掌握了个人和社会幸福的关键,这种幸福来自于过去的持续经验以及根源、归属和性质的认识。档案人员要知道,在希腊神话里,记忆是众神之母,通过她,我们才能进入健康和富有创造力的‘成熟期’”。在报告中,T.库克还提出了“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地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这一著名论断。^①在《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一文中,T.库克从后现代的视角,考察了档案和档案工作者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影响和作用。T.库克在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实证主义的档案观进行诘问、反思和修正的同时,批判性地指出:固有的观念认为,档案工作者记录过去而非未来、处理历史事件而非现实或未来事件,他们不构建历史和记忆,只是从事保护工作而非记忆工作,这种抹去符号的做法使档案成为“幽灵”,在知识形成的构成中并进而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隐形状态。为此,他认为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惟其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某些重要用户或传统用户的价值,将社会记忆的定义局限于有权者形成并留存的文件记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②

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布劳因在《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一文中,主要从社会记忆的角度考察了权力对档案可靠性、客观性的影响以及档案工作者的角色。作者指出:档案涉及权力,这就意味着权力借助档案而留存于史。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设档案是与社会记忆同一的,档案是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忆,更糟糕的是,它是有目的的记忆,档案正在成为理解、恢复和表达社会记忆这一挑战的中心问题。档案工作者实际上是肯定现行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文件的形成和解释过程始终受到第三方(即档案工作者)的介入,“档案工作者实际上发挥着中介者的作用……在文件和读者之间,在文件信息产生的各种知识与提供学术利用这些知识的方法和形式之间,都有档案工作者的介入和调停”,它将导致

^① [加拿大] 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黄霄羽译,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176页。

^② [加拿大] T.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李音译,《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2期。该文即是T.库克参加美国密歇根大学举办的“档案与社会记忆”系列研讨会(2001年2月)上所做的发言。

对档案的重新认识和界定。^①美国另一位学者 Randall C.Jimerson 也关注到档案记忆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反映,档案工作者和手稿保管者在选择文件和为研究者提供利用中所充当的中介角色。他在 *Archives and Memory* 中指出:“档案记忆是一种社会建构,反映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档案工作者和手稿管理者在选择档案保存和提供档案集合的研究利用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②

相比之下,日本国家档案馆副馆长大滨彻也重点讨论了档案馆作为“记忆的殿堂”的性质,以及档案馆在电子时代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新环境,在此环境中国家的每一位公民可以证实他或者她的身份,回忆并分享国家的记忆。他指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当社会的记忆通过国家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就被看作社会的精神财富,由这一代传给下一代,国家的故事也就被创作出来了,档案馆确切地说是文件的仓库,可以唤醒和培养国家的记忆;同时档案馆作为知识的宝库和文件的保管地,可以用来回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不管怎样的形势,档案馆作为记忆的宫殿,必须担负职责,提供回忆过去和分享社会、国家及人民失去记忆的场所。^③

以上是对几篇文章或报告的分析,它们涉及档案记忆研究的几个基本主题: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作用、权力对档案记忆的影响、档案工作者在档案记忆建构和传承中的角色、档案馆作为记忆宫殿的责任等,这些成果已被我国学者多次引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档案学研究中,有些学者已开始将“记忆”作为一个理论要素融合进理论体系之中,如澳大利亚档案学者伊恩·麦克莱恩和弗兰克·厄普沃德创建的“文件连续体模型”中,将机构记忆和集体记忆作为文件连续体模型的第三围和第四围来看待,这表明档案学理论新的综合与发展。

(三) 我国档案记忆研究状况

我国将档案作为记忆来看待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对档案起源的论述。1961 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档案史教研室编的《中国档案史讲义(初稿)》中指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实践,要求彼此交往,当时只能依靠语言来表述和交流思想与经验。但是语言不能远传,也难记忆。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为适应复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人们就开始了‘结绳’、‘刻契’的记事方法。结绳和刻契是帮助人们记忆、处理事务的一种方法”。^④进入 80 年代后,中国人民大学陈智为教授在《档案

① [美] 弗朗西斯·布劳因:《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晓牧、李音译,《中国档案》2001 年第 9 期。

② Randall C.Jimerson, “Archives and Memory”, *OCLC Systems & Service* 19.3 (2003), pp.89-95.

③ [日] 大滨彻也:《档案能再现我们社会的记忆吗?》,赵丛译,中国国家档案局门户网站, [EB] http://www.saac.gov.cn/news/2012-01/05/content_13546.htm [2012-1-5]。

④ 参阅王德俊:《当前国际档案界学术新动态、新观点概述》,《兰台世界》1998 年第 11 期。

社会学概论》中将“延伸记忆”作为档案的文化表现之一，他继承并发展了档案起源论中关于结绳、刻契为人类记忆辅助系统的思想，指出从档案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其每个发展阶段都是以增强人类的记忆功能为核心的；国家档案工作体制的出现，使档案记忆系统成为社会专职的机构，人们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控制档案记忆功能为人类服务。^① 这些论述只是对档案功能的一种观念表达，并未进入学理性层面。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国外档案记忆理论思潮的渗透和社会记忆理论在多学科研究兴起的影响，我国档案学界将“社会记忆”概念或观念引入学术研究，有意识地开展档案记忆问题探讨（笔者称之为“档案记忆观”）。学者们围绕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档案工作自身的社会记忆建构性质、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作用，以及档案与国家—民族认同、档案文献编纂与社会记忆建构、社会记忆观对档案学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发表了多篇学术成果。如：《钱学森先生关于档案的两次论述及推论——兼论档案是最典型的记忆工具》（杨惦南）、《档案馆应该保存什么样的社会记忆》（陈忠海等）、《浅论照片档案的历史记忆与再现功能》（张彤）、《档案与档案工作：固化的记忆与记忆的固化》（丁健）、《民族记忆与档案》（任汉中）、《论档案编研与社会记忆的构建》（卫奕）、《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薛真真）、《权力因素在档案构建社会记忆中的消极作用及其应对策略》（张林华等）、《基于社会记忆理论下的档案与历史关系》（汪孔德）、《社会记忆视角下档案记忆建构探析》（尹雪梅等）、《论档案的记忆属性——基于社会记忆理论的分析研究》（潘连根）、《社会记忆与地方社会秩序——以徽州历史档案为分析对象》（杨雪云等），以及笔者近几年相继发表的《社会记忆与档案学研究的拓展》、《论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论档案记忆研究的学术坐标》、《论档案与社会记忆控制》、《档案记忆能量探论》等。这些论文运用社会记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吸收和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资源，力图避开档案文件观、档案信息观、档案知识观等既有的研究路径，在新的价值取向和意义范畴内展开对档案、档案工作的新阐释和新探讨，用另一种方式看待档案和档案工作，以期获得不同的解释。

根据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文献数据，1994—2012年间，有关“社会记忆”的论文共102篇，其中档案学成果41篇，约占40%。此外，目前已有多项科研课题列入国家或地方科研计划，除本课题外，有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记忆与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研究”（上海市档案馆郭红解研究馆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记忆视野下的重大事件档案管理机制与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四川大学蔡娜博士主持）、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以徽州历史档案为分析对象”（上海大学丁华东教授主持）等。结合前面提到的学术事项，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运用社会记忆理论来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正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

以上学术事项所代表的学术活动以及诸多学者的个人论述，标志着档案学研究

^① 陈智为：《档案社会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3页。

“走进记忆之门”。“记忆”成为档案学研究的新视野，促发人们对档案和档案事业进行新的思考。通过近 20 年来的学术探讨，人们对此获得了一些基础性认识：如档案是社会记忆的工具或存在物；档案馆是保存记忆的宫殿；档案在国家、民族认同中具有重要意义；档案界将自身从事的工作视为保护社会记忆的工作，面对新的记录方式和记录手段，档案工作者应该进行职业思考，以确保我们的共同记忆得到保护，等等。

但是，进入记忆之门的档案学还只是个开头，我们的研究视野尚显狭窄。由于受社会记忆建构观的过度影响，我们对档案记忆的研究还多是在“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这一主题下所开展的一些探讨，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我们综合多元视野，深入、系统地分析和阐释，诸如档案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形态的理论基础、在社会记忆中如何看待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问题、档案与社会记忆控制的合理性、档案与“反记忆”等；同时在社会转型期，保护、开发、共建、传承社会记忆，需要档案部门主动参与，需要我们研究档案记忆以探讨档案（工作）传承、建构、控制社会记忆的功能与机制，为档案工作提供观念和理论支撑。档案学者需要发挥学术想象力，努力有所发现和有所贡献。

三、档案记忆研究的基本概念与研究思路

（一）发挥档案学想象力

美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著有《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在对传统社会学理论进行批评的同时，极力倡导社会学的想像力。他指出：“他们（社会学的研究者）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像力”^①；“社会学的全部使命就是发展社会学的想像力”。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社会学的想像力》已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成为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和提升社会学学术品质的必读之物，“稍有点社会学知识的人都喜欢把它挂在嘴边，时不时拿出来装点门面”。不仅如此，循着米尔斯的思路，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也都在称颂米尔斯的深刻思想，畅谈本学科的学术“想像力”。

“想像力”确实是一个美妙诱人的名词，无论在文学艺术、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在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都被一再地倡扬，以此作为激励人们努力创新的动力。马克思说“想像力是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爱因斯坦说“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可以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

^① [美]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3 页。